

论《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 动物书写的好客伦理

许希夷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当代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在地图结束的地方》通过小狗骨头先生的视角,深入探讨人与狗双方如何超越物种、语言和身体的限制,建构跨物种伙伴关系,体现“绝对好客”这一伦理倾向。骨头先生的遭遇作为隐喻,独特地呈现了主人威利一家身为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历史境遇。小说中的狗作为“他者”,深刻揭示了在权力扩张和同化过程中,边缘群体如何失去家园和主体性,成为被建构的从属存在。小说借动物叙事警示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勾勒出友爱、平等的梦想之地“汀泊图”,展现理想的伙伴关系模式及其伦理意涵。奥斯特通过动物书写探讨了美国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传达了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

关键词:保罗·奥斯特;动物书写;好客伦理;伙伴关系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3-0059-08

《在地图结束的地方》(*Timbuktu*, 1999, 以下简称《地图》)是当代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1947—2024)创作生涯中别出心裁的一部小说。《地图》以杂种犬骨头先生作为叙述者,透过其所见所思,观照语言、历史、社会等方面的诸多现实问题。学界通常将《地图》置于动物书写的体系和传统中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出版于世纪之交的《地图》再次证明了动物书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流派,对当代文学想象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①。小说以“独特的跨物种超越性”^②丰富了当下的“动物话语”^③。不过,也有研究者批评小说“过量的情感”和“寓言式的道德观”,认为学界对小说的价值存在误读和轻视^④。本文思考和讨论以下问题:动物书写如何受限于人类中心主义,又如何突破语言、身体等维度来探索跨物种超越性?以狗为代表的动物命运如何与大屠杀幸存者的遭遇相互交缠?人与动物之间脆弱的伙伴关系能否在动态的权力结构中维系?动物与被他者化的人们能否共同构建理想的伦理关系?在美国保守主义甚嚣尘上、社会冲突愈发激烈的当下,重新审视《地图》中的动物书写,有助于从文学的角度启迪人们深思伙伴关系、好客伦理和博爱等议题在当今社会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人类中心主义与跨物种超越性

在文学世界里,动物往往不仅是叙事中的角色,更是文化、历史与社会结构的隐喻符号。当今世界的人们在追求技术进步与物质富足的同时,与自然及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愈加复杂。人与非人类物种

收稿日期:2024-10-24

基金项目:东南大学新进教师科研启动经费(RF1028623348)

作者简介:许希夷(1992—),女,江苏南京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Brown, L. *Homeless Dogs and Melancholy Apes: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in the Modern Literary Imagination*. Ithaca: Cornell UP, 2010, p. 142.

②Brown, L. *Homeless Dogs and Melancholy Apes: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in the Modern Literary Imagination*. Ithaca: Cornell UP, 2010, p. 114.

③Ittner, J. “Part Spaniel, Part Canine Puzzle: Anthropomorphism in Woolf’s *Flush* and Auster’s *Timbuktu*”, *Mosaic: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Journal*, 2006, 39(4): 181-196.

④Ciocia, S. “The Career and Critical Reception of Paul Auster”. *Literature Compass*, 2012, 9(10): 642-653.

共同面临环境、气候等生存危机与挑战,需要重新建立起“友邻和伴生”的关系^①。动物书写作为文学对非人类存在的艺术化再现,为人类提供了反思自身行为、审视道德与伦理边界的镜像。奥斯特等当代作家的作品借助动物的叙述视角,超越物种的界限,探讨了人与非人类存在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共生关系。这种跨物种的书写不仅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空间,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对动物权益、生态平衡以及人类道德责任的高度关注。通过动物角色,文学能够引发对现代文明的深刻质疑,呼唤更加包容与伦理化的社会模式。在此背景下,动物书写及研究不仅具有文学审美的意义,更具有时代性和文化价值,是对当代人类生存环境、伦理实践及社会结构的一种深度探讨。

在所有动物中,狗作为人类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与人类的关系尤为密切,狗的叙事也占据动物书写的首要地位。自20世纪初,人们开始意识到狗在日常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及不可替代性,“不仅生出将狗视为私人财产的观念,更将街头任意一只狗视为自身的延伸,保护它们免受暴力侵害”^②。人类与狗之间的情感联系日益增强,唤起了人们想要将狗当作哈拉维所言的“同伴物种”的期望。然而,在诸多共性之下,二者间仍然存在着“本质上的隔阂与分离”^③。自此以来,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更加关注狗的身份界定及人与狗关系的复杂性,深入探讨狗的情感、智慧与生存哲学。狗与其主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不存在等级差异,而是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以狗为主的动物书写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展现了丰富而灵活的想象,贡献了独特的文学价值。

在动物书写与研究中首先需要直面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挑战。如伍德所言,人们“在描述‘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时,必然从‘我们’的视角出发”^④,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面临忽视、低估或过度揣测等问题。有学者指出,某些人对动物的兴趣或许“源自自恋欲望”,他们试图通过动物“反射自身的优越性”^⑤。这种观点默认非人类生物处于劣等地位,探究动物多是自我形象的投射欲望使然。实际上,动物的存在更注重存在性本身,人类为动物划分的种属、品种、血统等社会性标签,实则是基于自身的“表演性驱策”^⑥,缺乏在动物世界中的实际意义,预设了人类的“高等”地位。

另一种常见的批评视角认为,人类通过动物他者反思自身的存在性危机。正如有学者所言,“对自我的书写包含对他者的书写,反之亦然”^⑦。一些研究者认为语言是人类与其他生物沟通障碍的根源,因为“它们不说我们的语言,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们的叫声”^⑧。这一看法揭示了动物书写的两难困境。然而,进一步的思考表明,持有“语言无法表达动物存在的完整性”这一感受,实际上基于一个假设:即语言能够准确传达人类的思维与情感^⑨。此假设已经受到解构主义理论的挑战,语言作为漂浮的能指符号,无法完全捕捉或表述人类对世界的所思所感,书写不可再现之物(the unrepresentable)实际上是书写这一行为本身所面对的困境。

奥斯特曾表示《地图》“与语言有很大关系,基本是关于威利的语言,以及骨头先生理解这种语言的方式”^⑩。小狗努力地学习“英古利希”(Ingoolish,“English”的变体,模仿小狗最初接触这一单词时不标准的发音),同时威利对狗的表达方式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①王宁:《当代生态批评的动物转向》,《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②McHugh, S. *Dog*.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4, p. 137.

③Anderton, J. “Dogdom: Nonhuman Others and the Othered Self in Kafka, Beckett, and Auster”,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2016, 62 (3): 271-288.

④Wood, D. “Comment ne pas manger: Deconstruction and Humanism”. *Animal Others: On Ethics, Ontology, and Animal Life*, ed. H. Peter Steeves. Albany: State U of New York P, 1999, p. 20.

⑤Ittner, J. “Part Spaniel, Part Canine Puzzle: Anthropomorphism in Woolf’s *Flush* and Auster’s *Timbuktu*”, *Mosaic: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Journal*, 2006, 39(4): 181-196.

⑥Simons, J. *Animal Rights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 10.

⑦Anderton, J. “Dogdom: Nonhuman Others and the Othered Self in Kafka, Beckett, and Auster”,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2016, 62 (3): 271-288.

⑧DeMello, M., ed. *Speaking for Animals: Animal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New York and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p. 5.

⑨Demello M. *Speaking for Animals: Animal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New York & Oxon: Routledge, 2013, p. 26.

⑩Auster, P. “Q and A with Paul Auster”, www.bluecricket.com/auster/articles/qanda.html.

有太多东西要学,有太多现象要了解、破译和理解。……摇尾巴和把尾巴夹在两腿中间,竖起来的耳朵和软塌塌的耳朵,满地打滚和原地跑圈,闻自己的屁股和发牢骚地叫,袋鼠跳和空中急转,匍匐前进,露出牙齿,竖起脑袋……威利发现这就像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①

威利对狗的交流方式感到费解,表明语言困境即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解构。人与狗之间的“无法理解”是双向的:人类通常忽视狗的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能够轻松理解动物的表达,也无法证明人类语言是优于动物的沟通方式。作家们在动物书写里时常暗含对语言可靠性和沟通有效性的质疑。德里达著名的论断“文本之外无他物”^②阐释了语言的去中心化,意义产生于语言和符号系统相互作用的开放体系中,并非来自外部世界的直接传递。换言之,语言本身无法全然表达世界的意图,沟通总会伴随着差异和误解,而不同生命形式的交流方式具有各自的意义体系。故而人与狗之间的交流障碍并不源自语言的等级高低,而是存在根本的差异性。从这一视角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不比人与狗之间的交流更为顺畅。实际上,狗通过嗅觉、肢体动作等方式所做的沟通,可能比人类的言语表达更为高效。因此,可以说人与狗在沟通有效性上是平等的,两者之间的理解障碍并无本质区别。

当代动物书写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又促使人类通过动物他者反观自我和重新认识世界。正如斯泰因(Gertrude Stein)所言:“如果我是我,那么我的小狗就认识我。”^③这一表述足以引发对个体身份、自我认知、人与世界的关系等多重命题的深刻思考。威利虽然也有人类的思维盲区,但他能够在反思中意识到,自己未能像尊重他人一样平等地尊重骨头先生,且为此深感忏悔。威利认为,除去是否掌握人类的语言文字这一方面以外,狗与人类并无太大差异;狗值得人类所拥有的一切政治权利;识字的狗可以成立自己的国家;地球上很难畅想出一个无视差异的理想之地,在狗的共和国里,人类会是奴隶。威利做出了基于人类历史的疯狂想象,表面上看似一场人类中心主义的展演,然而实际上反映出他对狗与人类生而平等观念的潜在认识。

在小说中,威利不吝于给狗最高的荣誉和赞美。他以诗人的眼光评价“骨头先生的灵魂比其他的灵魂要好许多”,“最低等的造物在它的名字中蕴含了最高造物、全能的造物主的力量”。以“最低等的造物”作为反讽,威利尊重骨头先生的异质性,并善意地回避了人类制定的物种分类名称:“他首先是他看上去是的那种东西”;同时,威利又将狗的灵魂神圣化,与人类灵魂同质化。与之相应,骨头先生则视威利为“有着狗心的人”,“是独一无二、即兴改变规则的两条腿生物”。尽管二者外形迥异,但他们却并不将表面差异视为伙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更看重“灵魂”和“心”这样的内在本质。

威利在赞美骨头先生的过程中具有更强的自觉意识,反映他自身对美国社会和人类世界的深刻怀疑和悲观态度。他是被多重秩序排除在外的人,拥有难以定义的社会身份,而他的愤世嫉俗与离经叛道也有其根由。甚至可以说,骨头先生的命运或说犬类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威利和家族命运的一重映照。

二、历史记忆的隐喻与“绝对好客”

奥斯特在《地图》中首次将大屠杀的历史作为创作背景。与同时期多数犹太裔美国作家不同,他很少将犹太性作为小说关注的核心,但“犹太传统”仍会在小说里“令人惊奇又不容忽视地突现”^④。奥斯特曾在访谈中解释:“我对犹太民族的历史充满感情,但我没有书写犹太性的冲动。它是我的一部分,可能会出现在书中,也可能不会。它不是构成我的主要来源,而是众多因素之一。”^⑤关于动物的作品和

①保罗·奥斯特:《在地图结束的地方》,韦玮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②Derrida, J.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1976, p. 158.

③Stein, G. *The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America, or The Relation of Human Nature to the Human Mind*. New York and Toronto: Random House, 1973, p. 109.

④Barone, D, ed. *Beyond the Red Notebook: Essays on Paul Auster*.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 1995, p. 23.

⑤Varvogli, A. *The World That Is the Book: Paul Auster's Fiction*. Liverpool: Liverpool. UP, 2001, p. 72.

研究通常与后殖民议题相关联^①,较少书写二战期间的犹太历史。《地图》中的骨头先生在被驱逐出家园、失去威利这个“同胞”的庇护后,四处逃亡和流浪,曾试图融入美国普通家庭,又因为自身的异质性和独立性而失败。小说里狗的遭遇实际上可以视作威利这个犹太家庭命运的平行寓言。

威利的父母古尔维治夫妇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幸存者。在两个波兰家庭里,只有他们幸免于被送至集中营的命运。但这仅仅意味着肉体的延续,在战后抵达美国的夫妇俩困在“两个死亡之间的短暂间隔”中。尽管小说未具体描绘夫妇俩死里逃生的细节,骨头先生的逃亡经历却与之相似。小狗对威利的死亡一事抱有本体论的恐惧:“把威利从这个世界上抹去,可能这个世界也会随之消失。”在历史上,面临着“世界消失”危机的种族并不少见,如北美印第安人和二战时期的欧洲犹太人,他们均丧失了家园的庇佑,文化也濒临消亡。古尔维治夫妇与骨头先生同样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权及社会性身份,沦为“赤裸生命”,以自身纯粹的生物性直接面对暴力机器的审查或处置。骨头先生在危急关头被迫离开濒死的威利:

两个穿着警服的大个子从车里钻出来……腰上别着法律的武器:左轮手枪和手铐,警棍和枪套,手电筒和子弹……在这个令人恐惧的时刻突然来临时,他舔了舔威利的脸,呜咽叫着说了再见……以它最快的速度逃走了……他强烈地感到想要张开嘴巴大声号叫……但他抑制住了这冲动,他很清楚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制度性的暴力通过警察的现身具象化,表明暴力背后合法化的规则支持,使施暴者得以豁免。骨头先生即将成为不被城市所容许的流浪狗,面对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古尔维治夫妇在逃离波兰之后的经历与这只小狗在本质上如出一辙。

小说中仅在一处明示了这一并置关系。在威利死后,骨头先生一度想要放弃生命,但脑海中的威利用母亲的经历鼓励他:“他们那时候也追杀她。像狗那样追杀她,她为了活命,不停地逃跑。人也会被像狗那样对待。”此处所说的“狗”不再指涉骨头先生,而是作为特定物种的抽象概念指代所有遭受压迫的存在。同样,“人”也从个体扩展为对全人类的模糊指涉,暗示了人类社会随机降临的“例外状态”的恐怖,任何人都随时可能陷入“非人”的生存绝境。这种隐喻性并置并不意味着对大屠杀的轻慢或降格。有学者认为:“把奥斯维辛排除在隐喻之外即是把它彻底排除在语言之外”^②,因为它通过象征方式传达了无法直述的痛苦,而这一手法对纪念历史至关重要。J·希利斯·米勒进一步指出,在此使用修辞学中的“讹转”(catachresis,又可译为误用)一词相较于隐喻(metaphor)更为恰当,因为大屠杀的书写本质上就是“将来自其他领域的词语强加于某样事物上,而这事物本身拒绝表征化”^③。在不可表征这层意义上,动物书写与其具有一定的关联,动物在面对纯粹的暴力与死亡之时亦具有相似的脆弱性。

大屠杀的创伤瓦解了古尔维治夫妇的主体性,他们在陌生的美国文化中无法重建自我身份。大屠杀是集体的创伤,但即便经历相似的夫妇之间也不能互相沟通疗愈创痛。米勒质疑“亲眼目睹”(witness)这一概念,他认为即便同为灾难的亲历者,也无法向彼此传递个体的特殊体验^④。凯西·卡鲁斯指出,创伤体验是延迟反应,幸存者的无意识行为不断重现创伤^⑤。古尔维治夫妇在美国努力适应生活,但其犹太身份导致他们始终是“外来者”,威利视他们为“异乡客”,他们的“波兰口音和矫揉造作的

①相关研究参见段燕、王爱菊:《全球、残障与物种——论辛哈〈动物之人〉的动物叙事》,《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3期;但汉松:《“与狗遭遇”:论库切〈耻〉中的南非动物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张文雯:《论杰丝米妮·瓦德〈拾骨〉中的动物叙事》,《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2期等。

②Young, J.E. *Writing and Rewriting the Holocaust: Narrative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Interpreta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 Polis: Indiana, 1990, p.91.该文主要分析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的两部连环漫画小说《老鼠》(*Maus I&II*, 1986, 1991)。与《地图》中动物书写与历史记忆的隐喻性关联不同,《老鼠》通过连环漫画的形式直接展现了作者的父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恐怖经历及后续的创伤生活。他描画的犹太人以老鼠脑袋呈现,纳粹一方则是猫,暗示了压迫者的天性残酷,猫以玩弄猎物的方式体现了对犹太人的非人化虐待。这种动物象征提醒读者,背后的每一个形象都是一位真实的受害者。

③Miller, J. H. *The Configu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 Chicago and London: U of Chicago P, 2011, p. 152.

④Miller, J. H. *The Configu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 Chicago and London: U of Chicago P, 2011, p. 150.

⑤Caruth, C, ed. *Trauma: Exploration in Mem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P, 1995, p. 4.

外国做派”让他感到尴尬。因而,威利在多重文化体系中挣扎,父母的创伤反应让他难以获得正常的引导和支持。威利回忆,父亲常对微小错误反应过度,暴力对待自己,他最终甚至为父亲的死亡感到隐秘的解脱。“丧失功能”的父母无法担当保护者的角色,他们的暴力和沉默迫使威利融入美国文化,远离犹太背景,听摇滚乐、打曲棍球,甚至曾一度想“证明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作为移民的后代“不可避免地”与渴望的中心发生联系,但又被拒之门外”^①。威利回忆起母亲试图将他打扮成“广告中的美国男孩”,但外貌和家庭背景的犹太特质是他不言而喻的标签,成为他成长中的负担和枷锁。

威利在犹太与美国文化之间的裂隙中成长,这种分裂感延续到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校里短暂地超越了物种的界限。在一次酗酒和服用违禁药物后,威利被发现赤裸躺在地上,“吃着自己的排泄物”。奥斯特在描写中回避了人类与动物生活方式的等级评判,传达出一种中立的态度。德里达在讨论非人类动物时指出,动物无法感知“赤裸”的羞耻,因为它们天生赤裸,便无法在对比间建立起羞耻感与裸露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这种“无知觉”正是将它们与人类区分开的特质^②。因而,威利的赤裸和室友的凝视如同一个意义清晰的分野,这一更贴近狗而非人类的无意识行为是威利二十多年来挣扎过后最终结局的隐喻:他既不算是犹太人,也无法成为美国人,而是比“人”这一物种更为广义的生命存在,是一个具有语言和思维能力的“狗”,或一个行为“非人化”的边缘人。威利的生命状态反映了他融入社会的失败,并为他与骨头先生的伙伴关系铺路。

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反战氛围一度为威利提供了庇护,他只不过是“美国风情画上的怪人”之一。二战摧毁了他的家族,讽刺的是,又一场战争(越战)引发的反战情绪掩盖了他突兀的存在。在国家性的集体恐慌中,族裔等问题暂时被搁置,所有普通民众都暂居弱势一方。威利曾说:“正当你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等时,结果你却是一条最底层的狗。狗是比喻,是被践踏的象征”,这种“被践踏”的命运曾降临在部分人身上。而今反战呼声和底层愤怒从创伤中汹涌而出,各种“非人”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全国范围内的超越性奇观。在暴力与强权的压迫下,“中心”逐渐缩小范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己被排除在外,成为“底层的狗”,与更边缘的群体产生短暂的共情^③。

威利在一次顿悟后决心以“无私的爱”度过余生,“不求回报”地将自己奉献给世界。他的行为和思想充满了过分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对人类痛苦的响应。德里达认为,真正的“好客”(hospitality)不应该在同一性或互惠性中寻得,它不是西塞罗式的寻找“自我的理想形象”^④,也无关乎报答,而是对陌生人和异质性的彻底开放。威利的极端转变,尤其是他将名字改为“威利·基·圣诞”并纹身圣诞老人头像等行为,恰如德里达所说,是将个人身体与精神家园的大门向“绝对的、未知的他者”敞开^⑤,并通过行为和符号表达对“陌生”与“异质”的绝对接纳。他的转变令母亲无法理解,她将威利的圣诞老人纹身视为对犹太教的背叛,而纹身这个行为更让她联想到集中营和纳粹式的洗脑。这一冲突揭示了创伤后的“忠诚”(fidelity)问题,正如拉卡普拉所述,受害者在面对创伤时,可能将其视为一种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任何偏离这种创伤经验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对历史的背叛^⑥。

与其像母亲所认定的那样,将威利的选择解读为个人信仰的转变和对家族的背叛,不如将之视为他对“绝对好客”的实践。他在母亲去世后卖掉房产,与狗流浪,将财产全部散给慈善事业,还不惜冒生命

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扬、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②Derrida, J.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More to Follow)”, Trans. David Wills, *Critical Inquiry*, 2002, 28(2): 369-418.

③J.希利斯·米勒曾经反思,自己作为犹太人大屠杀的同时代人,在欧洲大陆上演着如此残酷行径的当时,对此竟然一无所知,而是在事后通过图像和幸存者证言等方式延迟了解这段惊人历史。并且他承认,美国人在纳粹统治时期拒绝犹太难民,他们千辛万苦地越过大洋来到美国寻求庇护,美国当时的行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纳粹大屠杀的同谋和帮凶(参见 Miller, J. H. *The Configu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 U of Chicago P, 2011, p.151)。由此可见,当事件发生的距离和受迫害的对象距离个体十分遥远的时候,人们不仅可以漠不关心,并能够以无知(ignorance)为良心开脱,也许人会更看重自己身边的狗伙伴,而对千里之外人类同胞的苦难无动于衷。

④Derrida, J.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Trans. George Collins. New York & London: Verso, 1997, p.4.

⑤Derrida, J. *Of Hospitality*. Trans. Rachel Bowlby.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0, p.25.

⑥LaCapra, D.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14, p. 22.

危险拯救任一陌生人。威利以近乎极端的方式开放地回应一切有关无条件之爱的召唤,而他坚持写作的习惯实际上也让语言成为“第二层皮肤”,让他在流浪中生出“归属的幻觉”,拥有身体这个“流动的家”^①。作为家园的主人,威利欢迎他者反客为主,甘愿让渡一切权利,乃至放弃生命。他身上承载了家族记忆、族裔身份和对美国经典文学文化的价值认同感等种种复杂性,最终通过“死亡”串联起来^②。临终前,威利在“美国文人”与犹太血脉之间达成了某种和解,这一和解既是对自我认同的反思,也意味着对全球文化和历史遗产的“绝对接纳”。他通过双关语表达了这一复合的身份,“我们曾在坡的世界(Poe-land,谐音波兰 Poland)里激动万分”,这不仅是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也是对祖先的回归。他在生命的终点并未如母亲期望的那样安葬在犹太公墓,而是在巴尔的摩与波兰之间找到了象征性的归宿。这种归宿不仅是身体层面,更是在精神和文化上对所有过往历史与多元身份彻底敞开。

三、权力的流动与伙伴关系的脆弱性

“绝对好客”的敞开性暗含着一种强制,即主人必须接纳所有不知来意的客人,允许他们进入自己的安全领地。这种伦理行为极大地挑战了主体的安全感,让主体的权力主动地进入流动的伦理生成状态。在威利死后,骨头先生历经主体身份和权力结构的转变,他关于“好客”的实践、质疑与失败体现出对当下伙伴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伦理反思。

骨头先生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逃亡后被数次收养。他首先进入中国移民家庭的男孩院中,随后又被美国白人家庭的妻女所接纳。这些家庭成员,无论是移民群体中的弱势个体,还是美国社会中的边缘人物,都表现出比传统“主流”人物更强的跨物种关怀与超越界限的能力。美国理论家理安·埃斯勒(Rianne Eisler)提出“伙伴关系模式”(partnership)这一理想模型,以取代“统治者的模式”。概括来说,伙伴关系社会强调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尊重与互助。权力不以压迫和支配为基础,而是通过协作和共同成长实现。她特别强调“差别并不一定等于劣等或优等”^③。在这种关系模式下,所有生命的尊严和价值都受到平等的尊重,社会不以强者为主导,而是寻求建立一种相互支持和共赢的动态开放式结构。但这种理想化的模式哪怕在微型结构的实践中也面临诸多挑战。

尽管小说中的边缘人物看似能够共情彼此、向超越物种的“绝对他者”更大幅度地敞开自身,但他们关于好客的伦理实践一方面暴露出诸多潜藏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又呈现出自身的脆弱性。小说并未将这些人与动物理想化为完美的“边缘者”,而是通过他们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身份转变,呈现了“统治者-边缘者”之间不断流动的权力关系。身处牢笼中的群体在试图冲破自身束缚的同时,又为离中心更为遥远的他者搭建起另一重牢笼,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抗争的意义,使得抗争实质上出于“自我中心”而非威利所憧憬的平等关怀。这种历史文化层面造就的冲突反映了跨物种伙伴关系面临的复杂性。那么,应该如何审视现有秩序结构对边缘群体造成的影响?以及在权力流动过程中,维持伙伴关系和实践好客伦理虽然同样基于差异性、指向脆弱性,二者之间又具有怎样的矛盾和张力?

骨头先生从威利那里学习和继承了威利对中餐馆的偏见。威利警告骨头先生远离中餐馆,称“大厨围捕流浪狗,把狗宰掉……在菜单里写成鸭肉猪肉”,这一刻板印象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原始想象,视其为野蛮的象征。萨义德指出,东方这一概念是“人为建构的内在一致性”,承载着西方的凝视和想象^④。在威利的视野中,东方被简化为未经过理性检验的“他者”。奥斯特通过骨头先生的“恐惧”揭示了这种偏见不仅仅是个体的误解,而且能够通过代际教育传递,造成更大的影响。小说中,尽管中国孩子亨利收留了骨头先生,使其免于流浪,骨头先生也善于独立思考,但他对亨利的评价仍充满了刻板印象,认为亨利“聪明、狡诈、长于偷窃”。然而,亨利的行为并非出于本能的恶意,而是父权制压迫的必

①Derrida, J. *Of Hospitality*. Trans. Rachel Bowlby.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0, p.89.

②Cranshaw, R. *Jewish Writ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Sorrel Kerbe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101.

③理安·埃斯勒:《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程志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④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页。

然结果。父亲的暴力与威权既是对家庭等级的捍卫,也是对亨利自主性和人性尊严的压制。骨头先生对亨利的观察,虽然看似印证了威利对中国人刻板印象中的某些“事实”,但实质上揭示了父权制对个体行为与社会道德的深刻影响。

在接触到另一美国家庭时,骨头先生遭遇了迪克这种通过隐性权威建立家中秩序的父权者。迪克通过为骨头先生提供独栋狗屋的形式,将其表面上的“接纳”转化为一种隔离,将其置于家庭之外,强调骨头先生“只是狗”,“狗是不会问问题的”。这一论断不仅强化了骨头先生的“非人”地位,还反映出父权体制下不好客的主人对个体施加的绝对控制。这种控制通过女主人波利受到的无形压迫而得到进一步体现,尽管她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但这些工作通常被社会视为“不具备市场价值”的劳动^①。波利在与骨头先生建立秘密同盟后,开始挑战丈夫设定的规则,如偷放骨头先生进屋玩耍等。尽管她通过细致的清洁工作掩饰了微小的反叛行为,但仍无法摆脱丈夫的监控和质疑。精致的牢笼使得波利虽然处于经济较为优越的阶层,却仍然深陷于家庭内部的性别压迫中,体现了社会阶层与性别角色的交织对个体自由的制约。

可以说,骨头先生与波利的伙伴关系体现出他们对非等级化关系的追求。对他们而言,差异非但不意味着威胁,反而能够通过互补等方式促进沟通和协作。为感谢他的活力与陪伴,波利对骨头先生敞开家门、开车带他兜风、为他争取权益,这些行为均可视作“好客”的表达,但她同样无可避免地将自己的认知和喜好强加给骨头先生,使他在物种内部短暂地享受了权力的幻觉,成为“狗中的资产阶级”,在物质享受中堕落。后来,当夫妻二人讨论是否为小狗进行去势手术时,波利和骨头先生之间相对平等的流动的权力关系被结构性的强权再次介入并摧毁,最终的决定象征着骨头先生身份的转变。去势不仅让他失去了曾经的“硬骨头”,也让他开始怀疑曾经对不平等结构的批判。经历了短暂的“天堂”生活后,骨头先生觉得威利曾经偏激地攻击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简直不可理喻:威利只“站在局外看待它们”,实际上“一旦你习惯了这种体制的结构,整天被拴在绳子上看起来都不那么糟糕了”,骨头先生“甚至都不再在意自己的名字是斯巴齐(Sparky)”。不介意改名一事实际上意味着骨头先生自我认同的丧失,他从一个具有独立性和反叛精神的个体,转变为被社会规范化的“宠物”,逐渐接受束缚。这一变化与去势过程密切相关,去势不仅剥夺了骨头先生的生理自主性,更消解了骨头先生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象征着他从一个反抗的“他者”变为顺从的“他者”。在既有的强大社会结构面前,个体和弱势群体结成的伙伴关系展现出根本的脆弱性。受压迫者在另一套社会结构中,尤其是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诱惑和欺骗下,一旦被同化为权力者的组成部分,极易逐渐放弃对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追求,最终只剩下被规训的模糊面孔。

此后,骨头先生爆发了急病,进入谵妄状态,见到曾经的威利这一情节,隐喻着他内心深处的剧烈冲突与自我反思。骨头先生践行“绝对好客”的理念,以开放、顺从的行为和思想接纳波利的改造,报答她的关心,想要维系他们之间友爱、和谐的伙伴关系。但他做出这一选择意味着“牺牲和背叛另外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献祭”了他对前主人威利的敬爱,放弃了对其他“全然他者”的责任,使他陷入了“好客的悖论”^②。从这一角度看,骨头先生的痛苦自省也意味着他对“绝对好客”这一信仰产生了怀疑:他与波利之间的伙伴关系基于反抗父权和彼此陪伴的共识,但“绝对好客”的绝对性恰在于质疑共识的可能性,认为真正的全然他者始终超越认知和预测。此外,在骨头先生敞开自我、成为“人质”^③、失去对身体的掌控之后,他已不再算作自身的主人,主客关系这一条件已然消解,好客的实践也随之不存。正如德里达所言,对“无限和无条件的好客”的向往和“好客的规则和条件”之间始终存在对抗^④,即伦理的绝对性冲击了现实中具体好客行为的条件性,而条件性又使得伦理的纯粹性无法达成,这种张力定义了绝对好客的不可能性。骨头先生在内心的挣扎中最终选择跃入车流,以期与威利在理想之地汀泊

①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②王嘉军:《好客中的伦理、政治与语言——德里达对列维纳斯好客理论的解构》,《世界哲学》2018年第2期。

③Derrida, J. *Of Hospitality*. Trans. Rachel Bowlby.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0, p.55.

④Derrida, J. *Of Hospitality*. Trans. Rachel Bowlby.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0, p.75.

图重逢,展现出投身不可能性的勇气,传达了他对平等和独立的永恒追求,以及对理想化伙伴关系的最终认同。

结语

在《地图》中,威利与骨头先生的关系不仅是物种之间的互动,更是一种跨越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深刻伦理对话。威利放下世俗身份与传统束缚后,试图寻回更为本真和纯粹的生命体验,以非等级、非功利的方式与骨头先生建立连接。他的做法不仅探索了“绝对好客”的理念,也成为对人类历史创伤的深刻回应。骨头先生作为“他者”,展示了边缘个体如何通过无条件的善意与理解,突破社会规范与物种隔阂,觅得自身的价值与归属。他以无言的忠诚和与人类的情感联结,与威利共同展现了一种超越物种界限的伦理关怀。

然而,小说结束在骨头先生跃入车流的瞬间,定格了永恒的“非生非死”状态,理想之地“汀泊图”也仅存在于人类与动物的共同想象中。这一结局不仅保留了理想伙伴关系的无限可能,也暗示了一个更为深远的命题:当同等地面对生命的脆弱性之时,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是否真的那么重要?或许,正是这种生死相随的坚固伙伴关系,使得骨头先生与威利的联结超越了物种、历史与文化的诸多界限,成为一种理想的伦理范式。可以说,奥斯特通过《地图》传达出向死而生的期许,呼唤人们在面对现代社会的割裂与冲突时,重新审视人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追求一种更加平等、友爱与包容的社会秩序。德里达认为,博爱是一个不可能的概念,但它的力量也正是来源于这种不可能性。正如小说中所隐喻的那样,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形态的差异与存在的持久,而在于追寻博爱的理想并付诸实践,以行动照亮世界的一隅。

Approaching the Ethics of Hospitality in the Animal Writing of Paul Auster's *Timbuktu*

Xu Xi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Timbuktu* by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 Paul Auster explores how humans and dogs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species, language, and body to form interspecies partnerships, displaying an ethical tendency towards “absolute hospitality”. Mr. Bones’ experiences serve as a metaphor, uniquely presenting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Willy and his family as Holocaust survivors. The dog in the novel, as an image of the “Other”, profoundly reveals how marginalized groups are driven away from their homeland and become constructed and dehumanized beings in the processes of power expansion and assimilation. The novel warns of the possibility of historical tragedies repeating, sketching an ideal place of friendship and equality named “Timbuktu”, while presenting an ideal model of partnership and its ethical implications. Through his unique animal writing, Auster explores the survival struggles of marginalize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and conveys a profound humanitarian concern.

Key words: Paul Auster; animal writing; the ethics of hospitality; partnership

(责任校对 王小飞)